

人的可塑性及其背景

孟旦¹ 译者：肖妹²

(1. 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美国；2.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中西比较考察人的可塑性与先天性、确定性的关系，认为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的力量是为人所熟知的，而其中大多数都是家庭范型的外延类推，这是一种熟人社会的模式，但是它会影响到群体或家族的知识更新。可以说，对血缘关系的重视所反映的是家族选择的生物原则。

关键词：可塑性；先天性；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人们以许多方式从不同侧面来谈论人的可塑性，但在近代，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类主题却很少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性质是基于可塑性的字面含义及其引申出来的伦理、政治内涵而言的。我们唯一可假定达成共识的是讨论的主题是社会上的非细微的特性。可塑性是普遍而确定不变的，还是可以由个人选择或是可由文化塑造？细微的特性是各不相同的，而不是普遍的，这一点已得到了认可。显然，人有高低之分。

对于西方人来说，此论题是旧有的本性与教养之争的一个方面。一位广受欢迎的科普作家以《本性与教育》^[1]为其书名来意指二者是相互关联的。这一点在新世纪伊始已广为大家所接受，但是为什么那个古老的争论依然在持续？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对于西方人来说，通常认为是维护自由意志的需要。本性通常是和我们所无法控制、无法选择的东西相联系在一起的，而教育则相反，因此教育的某些方面总是得到人们的支持。自由选择是与个人的责任和阻止反社会行为相连的。对此下文将做较详细的讨论，在此暂不涉及。其二，论争中的学科分化：许多学科都赞同生物学和文化两方面都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同时也有一些人则倾向于单方面的作用。例如，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只有文化（一种教育形式）是有意义的，生物学则与此毫不相关，甚至所有其他的影响因素都是微不足道的。

从一个方面看，在近代以前，儒家有一种人性不变的观点。凡人皆天生具有孟子所谓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皆能由此四端扩展开去，虽然程度不同，但是潜意识中具有先天的善端，此善端即使有不利的环境影响也不能使之消失。这种观点是基于人同此心论来讨论的。然而儒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接受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的修身养性或是通过圣人的教诲而摒弃杂念，恢复被隐藏的原初天性，从而达

到完善的人格。因此特权受惠的基础不是血缘关系，而是科举制度（作为优越标准的成功教育）以及国家对设立学校和控制课程的极早关注。因此，在 20 世纪以前，可塑性的观念与人性不变论是共存的。这在中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种观点支持了自我完善的预言。自我完善预言论者认为通过教育，人们能够实现德性的完善，并从而将自己贡献给一个和谐的社会。在近代中国，这种观点曾激发政治改革者不断强调以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以图“救国”。

在 20 世纪后半期（1949—1976），可塑性的观点又占据了中心地位。中国那时对此种观点的解释方式反映了一种政治考虑，而这种政治考虑在上个世纪后 30 年间，也曾出现在英国和美国的生物社会学的论争中。因此，本文第一部分表明了此论题如何有一个文化转型之维度，而不仅仅限于中国；最后一部分总结了科学主张对可塑性所达成的共识，他们试图与政治争端区分开来。

可塑性胜过先天本性

中国近代的一些思想家曾将中国的某些衰弱归因于可憎的儒家文化遗留的影响，其中，孟子固定不变的普遍人性观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先验的人性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普遍人性论忽视了人们的社会性的差别，忽视了差异性胜过“四端”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先验意味着不可改变。从心理学上看，这就暗示了人们不能被改变成为某种工具，以使中国在社会上、经济上都迅速地得到改变。因此，中国不能得救，作为圣贤先师的领导者在寻求拯救时没能发挥什么光荣的作用。人性可塑性的观念，传入了最易于被文化人士和传教士所控制的三个领域：哲学、文学和心理学。¹

在上述时期，哲学的评论否定存在有普遍性的、先天的同情心，那种认为维持生活是一种普遍本能的温和主张也受到了抨击。北京大学著名的哲学教授冯丁曾宣称那种“衣食无忧，居住在宽敞洁净的房子里，享受爱情……”的生活观还掺杂着生物性的斗争^{[1] (p59)}，但是这个目标忽视了把人们的精神转移到新的工作。

一种传统的标准（权威）观点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用一个个别的例子来表现一种普遍的人类状况。因此巴人（王任叔，前《文艺报》编委）和一个外交官说“人们都喜欢鲜花的芬芳，小鸟的歌唱”^{[1] (p59)}，但是批评者认为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阶级的人们对这些刺激的反应是不同的。同时考虑到社会行为来说，这类刺激是不足道的，而非实质性的。因此集中表现这些的一种文学也是微不足道的。

从心理学上看，始于 1953 年，苏联访问心理学教授向中国人传授作为苏联正统观念的巴甫洛夫学说，即在人类神经系统的设计中，人类行为有一个确定的物理基础。同时，苏联教师还强调神经系统的可塑性比它的确定性更重要，人们有极大的可能性来获得条件反射，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转化为无条件反应。直到 1958 年中苏两国关系开始出现紧张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发现由于把普遍心理学的特征归于人类，使得稍一提及巴甫洛夫的理论就会被指责为是“生物化的人”。生物性暗示了人性是固定不变的，而心理学家却大胆地关注人类的社会性和思想，而非其生物性或生理性。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被他们看作是不在于神经学上所谓的基本性格类型的差异，而在于他们主观的阶级立场和思想的差异。因此，三大领域（哲学、文学和心理学）站在一条阵线上仅仅强调可塑性，而不是确定的生物性。^{[1] (p64-68)}

同时，在西方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先由哲学家而后是心理学家，都变换着运用斯蒂文·品克（Steven Pinker）所谓的“白板”理论来向公众传递人的可塑性的观念。

^{[2] (p5)} 洛克、休谟和密尔这些经验主义者宣称，我们的心灵如同白板，经验将内容书写于其上。行为主义者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和后来的斯金纳（B. F. Skinner）运用公式重新表述了相同的基本原则，同样忽视了那些可能先天内在于心灵的东西。这种宣扬可塑性的运动到了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和涂尔干（Durkheim）那里达到了极至，他们声称我们的个人性格无非就是被社会因素所铸造出来的。^{[1] (p205)} 人类的共性，或者说普遍的人性，涉及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才是重要的，而这些差异是没有什么生物学基础的。

后来，西方一些非常杰出的行为主义者在与那种重提人性的生物普遍性的斗争中继承了这种观点。然而，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在反对先天普遍性的论争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比如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列文汀（Richard Lewontin）。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威尔逊（E. O. Wilson）领导的社会生物学者。新奇的是中国在一定时期出现的一种政治关注。这类关注认为从生物学的路向来考察人性忽视了人的可变性中的政治兴趣，以及由此政治兴趣所引起的社会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反对者指责社会生物学论是种族主义，是想保留生存上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相反，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文化是影响我们的最终因素，而不是生物学，它使我们彼此不同。作为西方人来说，他们相信完全的自由意志。他们认为我们有自由来改变自己，改变整个世界；有责任去指责那些以先天不变性来阻止改变的人。可塑性胜过任何固定不变的生物性。^{[3] (p142, 182, 248, 391)} 文化就是一切，或者，人的社会性就是一切。

反对者的政治议程没有因为社会生物学（进化生物学或者进化心理学，亦或行为生态学）的主张而成为泡影，他们也意识到了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重要论断——“白板

说”只是独断论者的梦想而已。^{[4] (p153)}这样就提高了那些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操纵他人意志的“教育者”的地位和作用。

可塑性和确定性

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人性是环境（包括文化）与基因的共同产物的看法，那就意味着二者是相互作用的，这当然是社会生物学家诸如威尔逊(E. O. Wilson) 的立场。西默尔·本泽(Seymour Benzer)，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通过饲养果蝇来研究了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关联。关于他的著作，一位作家说道，“这些分子遗传学家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在进行着他们的工作，而此项工作终将有助于维护威尔逊和其他一些生物社会学家的主张。”²

我们这里再次发现了促成儒家的一些伦理规范与实际的人生条件相一致的因素之一。孟子的理论模式既相信与可塑性相连的教育的作用，又相信在“四端”之中存在着某些社会行为先天不变的基础。伦理规范的最根本的基础不在于超自然的存在或超然领域，而在于早期儒家所谓的人皆天生具有的一种原初本性，即我们今天称之为“生物性”。

当代科学立场把可塑性定位在如下三个论域内：第一，大脑神经通道的可塑性。神经传递素所运用的通道有很多种变体，相同的基因链有不同的形式，从而允许神经通道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这样在生物学上就为个性的巨大差异打开一扇门。^{[5] (p155)}这些基因以不同组合工作，产生出一个适宜于在不同类型的环境中工作的有机组织。^{[1] (p129-131)}需要在此提及的是能给个人造成不同影响的短期可塑性。有机体，比如海绵，也易于受长期的变化，有时是连续的变化，它们以此方式在基因码中表现显性，那就是它们怎样工作，怎样呈现。温度可能是引起变化的因素。像这样的“表型可塑性”对于那些怀有政治议程的人来说，是没有多大兴趣的。^{[6] (p255)}但是，神经中枢通道的可塑性是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教育者将他人的经验传递给学生时，的确能够培育新的大脑皮层神经元的成长。直接的或是间接的经验增强了神经元，否则它就会萎缩。^{[1] (p145)}因此，可塑性所依据的第二个论域就是教育经验对大脑的影响。但是不要忘了，由教育或者由他人经验所习得而来的（知识）也依赖于基因以及由基因帮助产生的神经环路来回反复地影响。

将可塑性与先天性放在一起考察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大多数个人行为（当然不是全部）的相对不可预知性。这部分是因为一个单个的神经细胞能从许多神经元那儿获得信息，而所有这些神经元都易于受经验所改变。^{[5] (p269)}大脑的变化过程不断地受社会事件的影响，而且，我们的大脑意识也是由相互斗争的不同派系所组成的。^{[7] (p58, 424)}基因给予我们自私的动机，然而也赋予我们以爱的能力和关注正义的能力。选择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事实，它作为最接近的经验根源，使我们避免处于凝固不变的形态。基因常常是什么都不做，除非我们的

选择向它发出信号。自然选择可能使我们安于那种增强我们的再生适应性的行为，但是我们能够选择与其相反的行为模式，比如决定不要孩子。我们关于抚养孩子的实例研究和法律体制表明，人们确实是将行为产生的后果意识纳入了他们决定的组成部分。假如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对于行动产生的后果，我们认为这样的个人就是有责任感的。^{[7] (p180, 185)}情感，位于某些可以确认的大脑区域，帮助我们做出选择，帮助我们预见未来。就我们决定允许什么样的情绪苦恼可以亲近我们而言，有时，那些情感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中的。^{[8] (p52, 80)}什么书可以读，什么朋友可以相互交往，都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孟子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与一些独断论者和那些相信“文化决定论”的社会科学家们相反，我们的可塑性也是有限制的。我们的基因结构的确形成了一些行为倾向或者说行为模式、癖性，从而影响着社会行为的特定形式。威尔逊(E. O. Wilson)列举了如下这些例子：父母对孩子的投资、利他主义、避免乱伦、协作和婚约³，另外还有寻求尊重和自治^{[7] (p164, 169)}。换句话说，我们天性中的这些固定的因素在潜在地（非强制）影响我们做出某些选择，但据此并非否认了先天素质也易于受到环境的影响。天性与后天教育是密切相关的，虽然先天素质并不决定我们的行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与我们作为人类是什么的任何描述都是相关的。先天素质使得我们易于去履行、并依赖于某些行为方式，这样就增大了那些违背我们先天素质的社会政策将会失败的可能性。回想以色列一些实行集体农场、公社抚养孩子的失败，你会发现，通常是无法成功地打破家庭锁链的。

最终，进化生物学的发现帮助我们辨识出孟子学派一些基本原则的所见与所弊。其中之一就是血亲之间相互利他主义的先天素质的能力，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的力量是为人所熟知的，而其中大多数都是家庭范型的外延类推，尽管并不必定牵涉到基因血缘关系。特别是在法律权威尚显薄弱时，这样的关系网会为他们提供庇护和服务。但是这样圈内圈外的界限也妨碍了信息的流通，妨碍了顺利解决问题，妨碍了新知识的增长。这些界限既限制了与同一个问题相关的人数以及其观点的多样性，也滋养了任人唯亲和腐败。同时，中国人的生存、繁衍和他们在群己层面上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血缘关系的重要性，而这种血缘关系正是家族选择的生物原则在起着作用。实际上，他们经常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运用类似的关系心理学。结果，血缘关系就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感情和好处。正如一位生物学家所指出的：“动机机制、情感体系和智识能力能够使我们了解血亲类别，确立与他人的关系，教育他人有关宗谱关系的知识，并对那些被确认为是亲戚的人怀有一种团结合作的意识，尤其是和我们最亲近的亲人。显然，选择偏爱那些具有上述因素的人。”^{[4] (p201)}

孟子学派，无论是在哲学层面上还是在一般的社会层面上，都与此种陈述不相冲突。

参考文献:

- [1] 马特·瑞德利. 本性与教育[M]. 纽约: 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2002.
- [2] 斯蒂文·品克. 白板说[M]. 纽约: 维京出版社, 2002. 5.
- [3] 尤利卡·塞格斯特拉尔. 真理的辩护者: 社会学论争中的科学之争及其超越[M].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142, 182, 248, 391.
- [4] 约翰·阿尔卡克. 生物社会学的胜利[M].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153.
- [5] 威廉R. 克拉克、迈克尔·格兰斯汀. 我们是冥顽不化的吗? - 人类行为中的基因作用[M].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155
- [6] 伊芙林·福克斯·凯勒、伊利莎白 A. 劳埃德. 进化生物学中的关键[M]. 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9. 255
- [7] 斯蒂文·品克. 大脑是如何工作的[M]. 纽约: 诺顿出版社. 1997. 58, 424.
- [8] 安东尼奥·达马西欧. 寻找斯宾诺莎[M]. 纽约: 哈考特出版社. 2003. 52, 80.

注释:

- [1] 我最初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第 48 卷第 609-640 页 (1971 年 10-11 月) “中国马克思主义中人的可塑性”一文中考察了这些问题, 后又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安阿伯: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年版; 后以《密歇根中国研究经典系列之三》(Michigan Classics in Chinese Studies) 再版, 2000 年) 第三章中又进行了考察。
- [2] 关于本泽 (Benzer) 的引用参见乔纳森·韦纳 (Jonathan Weiner) 《时间·爱·回忆: 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及其对行为起源的追问》(Time, Love, Memory: A great Biologist and His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Behavior), 纽约: 诺夫出版社 (New York: Knopf) 1999 年版, p. 177-178.
- [3] 爱德华 O. 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 《一致: 知识的统一》(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纽约: 诺夫出版社 (New York: Knopf) 1998 年版 p. 169 (双亲), p. 169, 205, 258 (利他主义), p. 193 (避免乱伦), p. 253 (协作), p. 171 (婚约)

Human's Plasticity and its Background

Meng Dan

(Professor of Michigan University ,America)

Abstract :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iew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s plasticity and his nature character. As

all to known the relation net in China is very strong . Most of them are developed by family mode so

they are mode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But it will play a role to knowledge renewal colony or family.

That is to say the emphasis to strain relation suggests biology principle during family choice.

Key words: plasticity; nature character; ascertain

收稿日期: 2004-08-28

作者简介: 孟旦, 男,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